

伊薩柯夫斯基詩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伊薩柯夫斯基詩選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總 119 單 65 32 開 182 定價頁

伊薩柯夫斯基詩選

黃 藥 眠 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北京初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線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1—12100(內精裝100本)

定價 5,000 元

作者自傳

一九〇〇年，我生在葉林斯克縣奧歇里斯克區的格勞托夫卡村的一個農民家庭裏（現在是斯摩稜斯克省伏斯霍得行政區）。

我父親的名字叫瓦西里·納札羅維奇，我母親的名字叫達利雅·葛里格列夫娜。他們有過十三個孩子（我是第十二個），但是只活了五個。其餘的在我出生之前，很小的時候就死了。

我們的家庭是窮困的，土地是貧瘠的。糧食從來吃不到第二年秋收，所以必須買糧食吃。因此在秋天收割完了的時候，父親就不得不出外去“掙錢糊口”。他少年時候每年都是這樣。從一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給人家砌爐子，安玻璃，

做各種細木工和其他工作。有時到離家很遠的地方。據說有一次到了彼得堡，又一次走遍了白俄羅斯。

後來他當奧歇里斯克區公所的郵遞員。每星期二騎上自己的馬走二十俄里到巴夫里諾沃驛站，收遞郵件，每年工資十盧布。

我的哥哥巴維爾，在我出世之前，就被父親送到區公所當信差去了。過了幾年，他被“提昇”為見習助理文牘員。

關於巴維爾，我想不起來了，因為他離家時候，我才兩歲（後來便不知下落了）。但是為了他，我姓了伊薩柯夫斯基。

經過是這樣的。我哥哥當助理文牘員的時候，有些不大重要的文件，就由他“代文牘員”簽發了。他本來姓“伊薩柯夫”，顯然是他覺得這個姓太平凡，又不太好聽，為了發音有力，他簽字時便不用“伊薩柯夫”，而用“伊薩柯夫斯基”了。從此以後，這個姓便由我們全家沿用起來。

我跟我哥哥一樣，讀書識字也是自學來的。父親的郵遞員工作促進了我的閱讀能力。他從

郵局運來報章雜誌等，這些東西在交給訂閱者之前或無法投遞的時候，我就可以瀏覽一下。父親也是粗通文字的，在他的幫助之下，我漸漸地先學會了閱讀，然後學會了寫。

那時鄉村裏識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幾乎成了全區裏唯一“會寫信的人”。附近各村作父親的、作母親的、作妻子的都找我給他們背井離鄉到城市裏“掙工錢”的親人寫信。我寫一封信，他們給我三個或五個戈比。我常用這筆錢到鄰近的小鋪子裏買點鱈魚或者三四兩糖。這時候我們家裏就像有了一場喜事。

一九一〇年秋天，我們區裏開辦了一個小學。小學校址暫時利用奧歇里村一個農民的房子，奧歇里村離我們格勞托夫卡村半公里。

我跟別家的孩子一同去“報名上學”，到了開學的日子，我就去上課了。因為我會讀會寫，所以立刻把我編入二年級。

但是這時候我深感生理缺陷的痛苦。女教師為了解釋什麼問題，用粉筆在黑板上寫，我雖然坐在第一排，仍是什麼也看不清。我的視力不

好，家裏的人當然早就知道。但是對於外人却煞費苦心地隱瞞着。因為村裏給人起綽號的風氣很盛，怕人家給我起些什麼綽號來取笑我，嘲諷我，戲弄我。

怎麼辦呢？我覺得沒有女教師的解釋，我當然完全不明白，但是她所解釋的——我看不見。我也沒有勇氣說出我的缺點。於是爲了不洩露我的“秘密”和不成爲全校的笑柄，我就中止上學了。不過這兒還有別的原因。上學的時候，特別是在冬天，我沒有穿的。真的，草鞋我自己會編——這樣腳上穿的就湊付過去了，但是衣服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整個一冬，就像常言所說的，“守着爐子”。

但是不久我父親跟女教師談話的時候，說明了我中止上學的原因，並且告訴她我的視力不好。女教師高朗斯卡雅就把整套二年級的課本送給我，我在家裏盡力研習起來。後來我總是以衷心的感謝懷念女教師高朗斯卡雅。

第二年，一九一一年秋天，我才又去上學，一九一三年春天，我畢業了，畢業考試的各門課

程都是滿分。

這個值得紀念的考試基本上決定了我後來全部的命運。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九一二年我就開始寫詩，倘若可以，就把這種天真的兒童的嘗試叫做詩吧。我的女教師知道了這件事，在畢業考試的時候突然叫我朗誦幾首我自己寫的詩。當然我非常着慌，非常胆怯，因為聽衆裏邊不只有來這兒參加畢業考試的三五個學校的學生，不只有我十分熟識的教師，還有監試的主要人物——神甫和以考試委員會主席資格在場的參議會議長。

我克服了胆怯，放開了喉嚨，朗誦了兩首詩：聖者和羅孟諾索夫。

這次完全成功了。在此以前，幾乎沒人注意我這個穿得破破爛爛的、光着腳的孩子，而且有些“打扮得頂講究的”學生，公然擺出優越感的、甚至藐視的態度看我。但是現在我突然成了中心人物。誰都跟我談話，誰都向我問長問短，給我出主意等等。教師們也都說，他——指我——

是個有天才的孩子，他應該深造，應該發揮他的天才等等。

我得到了勝利，歡欣鼓舞地回到家裏。

但是整整過了兩年，我才實現了我的宿願——深造。

深造——這多麼好，多麼誘人呀。可是我到哪兒去深造呢？我怎能深造呢？想法子入中學，固然可以，但是誰給我繳學費呢？到了城市裏靠什麼活呢？除了這些問題以外，我的眼睛也越來越壞了。無論如何需要到一個好的眼科醫生那裏看一看，需要到斯摩梭斯克去。但是我父親甚至給我湊幾個盧布的旅費和治眼的錢都辦不到，上中學更談不到了。

這時候，有個葉林斯克縣參議會裏負責國民教育的議員鮑戈丁出頭幫助我。

這個有教養的、善良的、富於同情心的人的所作所爲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他也是個沒有多少錢的人，他帶着我到斯摩梭斯克見一個眼科專家——拉茲維茨基大夫。不知道爲什麼，拉茲維茨基對我很冷酷，他大致作了這樣一個結

論：“情形十分嚴重。這個孩子有失明的危險。他不可以上學，也不可以種地。現在就應該把他送入盲人學校，叫他早點兒養成盲人生活的習慣。”

這個判決是嚴酷的，我懷着不可言喻的絕望的心情回到家裏。我覺得我什麼都完了，什麼都不能幹了，誰都不需要我，誰都不理我，而且忘掉了我的存在。

但是哪知道人們沒有忘掉我。首先是鮑戈丁沒有忘掉我。他決心把幫助我這件事貫徹到底，於是在一九一四——五年的冬天，他就把我帶到莫斯科去找著名的眼科醫生阿維爾巴赫教授。阿維爾巴赫教授給我診察了，他斷定我害的是帶有眼底溢血的、惡性發展的近視眼。但是他說，配上眼鏡可以上學，不過必須特別小心地保護眼睛。

這好極了。但是這時候我已到了按照規定，至少得入中學四年級的年齡了。所以前三個年級的功課需要自己事先準備好。

這時候教師們又來幫助我了。我們學校的

女教師——就是那位高朗斯卡雅，在夏天把我帶到札魯賓卡村她自己的家裏。那兒有個上過中學的斯維斯杜諾夫開始給我補習功課。當然他一個錢也不要。並且反而常常把他從別的地方掙來的錢化到我身上。離入學考試大約剩下三個月了。這三個月裏必須把三年的功課補習完。因此我不能有一點兒休息。我簡直是通夜地用功。

我這樣準備了功課，一九一五年秋天，投考斯摩稜斯克伏羅寧中學第四年級，我考取了。

伏羅寧同意不收我學費，同時鮑戈丁在葉林斯克參議會裏給我張羅到每月二十盧布的獎學金。此外，女教師瓦西里耶娃和塔爾巴耶娃，還有那個斯維斯杜諾夫都不時地給我物質的援助。

對於這些人，爲了他們的辛苦，他們的奔走和關切，他們善良的、富於同情的心腸，我表示最真摯的感謝。倘若沒有他們，我的命運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所以我不能不記住這些好人。

我在這個中學上學的時候，生活是很孤獨

的。住在一間小屋子裏，有什麼吃什麼。我跟同班同學合不來。他們絕大部分是富家子弟，我是“莊稼漢”。我們的口味、興趣、願望、機會都完全不同。

在這個中學裏，有一次我企圖暗示我和文學的“關係”。教師給我們出了一個作文題目——依照普希金的作品描寫高加索。我就用詩充當作文繳卷，一開頭是這樣寫的：

我的神聖的高加索，你多麼了不起呀！

我在兒時就渴望着看看你，

縱使看你一次——這個夢想

已令我對你神往……

憑良心說，我希望得到誇獎、鼓勵。至少也得個好分數。但是這次不同了。俄文教師一分也沒有給我，反而在作文的後邊用紅墨水寫道：“請你確切地完成指定的課題，不要隨便亂寫。”

在下學年，一九一六——一七年的學年，我同高班的同學斯維斯杜諾夫弟兄倆住在一起，跟他們處得很愉快。

一九一七年秋天，我轉到離家很近的葉林

斯克中學。但是只上了一兩個月的學。這時我家裏遭受了嚴重的物質的困難，我自己也不能靠獎學金生活了，因為幣值天天跌落。我必須找事做。

我離開了學校——那時我是六年級學生。我向主管方面申請當教師。主管方面委我當教師，但是暫時的，因為我中學沒畢業。我必須參加“教師”檢定考試。一九一八年夏天我參加了檢定考試，但是失敗了。於是我的教師“前程”結束了。我到區執行委員會當助理秘書。

一九一八年秋天，我入了黨，第二年初，被委派當葉林斯克縣地方報的編輯。其實這個報還沒有出，需要創辦。我工作了兩年，而且實際上只我一個人工作。一切材料——從頭一行到末一行，都得我抄寫，因為沒有打字機，也沒有打字員。我又看校樣，又看大樣，還時常搖印刷機（印刷機是手搖的）。

一九二一年，我被調到斯摩稜斯克工作——在省地方報工人之路工作。在那兒擔任過各種職務，因為眼病而中斷的很長的時間除外，整整

工作了十年。

一九三一年，我到莫斯科當集體農民雜誌編輯，工作了一年，這個雜誌是農民報出版的。

當了集體農民的編輯一年之後，我已經不能再擔任任何職務了，因為我的視力壞到對於任何經常工作想都不能想了。我不得不轉入“家居狀態”，只量力作點文藝工作了。

我的第一篇詩是一九一四年在莫斯科新地報上發表的。是一位教師給寄去的，並且註明作者是個鄉村小學學生。篇名叫士兵的請求。我是受了一首著名的民歌的影響寫出來的，開頭是這樣的：

垂暮的陽光

照耀。

垂死的士兵

說道：

朋友，寫吧，

寫給我的老婆——

叫她不要為我的命運

悲傷。

再代我
向她問候一聲，
叫她
別等待我回家。

倘若她
討厭寡婦的生活，
看中誰，
就跟誰結婚吧。

二月革命以後，我在葉林斯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消息報上發表了一些詩。我還在那個報上發表了五篇或七篇關於我們奧歇里斯克區的生活的通訊。但是這個報不久就停辦了，我的“新聞活動”也暫時中斷了。

不過，我總在繼續寫詩。當然按照“詩”這個字真正意義來說，我寫的這些詩就不是詩了。對於詩，我知道的太少，瞭解的不多，所以只能寫些無力的天真的詩句，而且往往是摹倣的。

我認爲一九二四年是我有意識的創作活動的開始。就在這一年，我寫了些詩，這些東西遠遠稱不上完美的詩，但是其中有了明確的詩的構思，明確的思想。這些東西才是詩，而不是往往一堆粗俗的押韻字的單純的湊合。我彷彿第一次感覺到什麼是詩，明白了我應該保持什麼路線，向什麼努力，走什麼途徑。從前寫的詩簡直是胡寫的，從真正的文學意義來說，也是沒有意思的。

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國家出版局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詩集稻草裏的電線。

這本詩集受到了極端不客氣的批評。

我很沮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爲我的希望所寄托的、我所信賴的東西被批評倒了，被消滅了。

現在過了多年了，我能夠十分公正地評斷這本詩集了。當然這本詩集裏有許多缺點，同時，毫無疑問也有詩的嫩芽——批評家沒有注意到，也許是不願注意到。

高爾基注意到了。他住在遠離祖國的意大

利，讀到了這個不出名的詩人的詩集，而且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二八年初的消息報上。他很稱讚我的詩。我立刻精神抖擻——這就不用提了。

後來我常常發表詩作（外省，種地的能手，詩選，及其他）。最近出版的有詩與歌（一九四四年國家文學書籍出版局出版），祖國之歌（一九四五年蘇聯作家協會出版）。我在報上，特別是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很多的詩。

大概從一九三五年，我開始搞翻譯。我譯的大半是白俄羅斯詩人，一小部分是烏克蘭詩人的作品。我譯了楊卡·庫巴拉、包戈達諾維奇、雅庫布·柯拉斯、庫列朔夫的許多作品。翻譯謝甫琴科、伊萬·弗蘭柯的作品比較少。我還給戲院譯了伍克蘭卡的劇本林中之歌。我譯的詩總共不下一萬五千行。

關於我的歌詞，我想特別提一下。誰都知道，根據我的作品譜出來的許多曲子是廣泛流行的。我早先絕沒想到我將來會寫歌詞，至於我的歌集，更完全是偶然的了。